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主 编 吴晓明 副主编 邹诗鹏（常务） 王金林

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

焦佩锋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主 编 吴晓明 副主编 邹诗鹏（常务） 王金林

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

焦佩锋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焦佩锋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8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吴晓明主编)
ISBN 978-7-309-09895-2

I. 唯… II. 焦… III.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3415 号

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

焦佩锋 著

责任编辑/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125 字数 259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895-2/B·479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710003）
复旦大学“985工程”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项目“思想史视域中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11RWXKZD005）

“思想史视域中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序

吴晓明 邹诗鹏 王金林

近些年来,我们与国内外的一些同仁一起,致力于推进和深化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终结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实质性地开启现代思想变革,进而全面影响现代世界并开创现代新型社会科学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视域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关涉和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视域的研究被长时间地延宕了,而其中的很多部分还停滞在粗疏草率的理解中。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中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其实质是从启蒙思想及其古典自由主义向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概要地确定为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古典哲学。这三个来源,正是欧洲近代启蒙传统在三个主要欧洲民族中的思想或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超越三大启蒙传统的突破口,则是古典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兴起之时,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巅峰。英国的自由主义走向成熟并与保守主义相关联,法国的自由主义成为异质于保守主义的激进思潮,至于德国则刚刚形成其独特的自由主义思潮。青年马克思从自由主义经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集中体现了当时欧洲从古典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理论高度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与光大者。不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潜存于马克思文本中的很多思想,其“互文”结构往往需要回溯到德国古典哲学,如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康德、费希特因素,黑格尔的法哲学、社会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辩证法等对马克思的影响,等等。但是,这样的研究不是要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德国古典哲学。在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

展,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都从属于一个完整的思想史脉络,即世界历史的“德国站”是如何展开的,马克思的努力又在于如何超越这一“德国站”,从而要求通过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规划世界史。就此而言,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真正理解和穿透德国古典哲学。

然而,从思想史视域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方面,而应当如马克思学说本身那样,包含应有的学科丰富性。其中尤应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为重点,正是这个领域包含着思想史上的丰富内容。

在欧洲思想史上,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反过来又激起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的变革及其回应,其结果是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借民族主义的全面兴起——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随后展开的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参与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需要面对的新课题。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联手应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曾经对抗的社会政治思潮,逐渐协调起来,并于19世纪70年代形成“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至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更是强调与新保守主义的同一,以抗衡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转变与保守主义的回潮相伴随,则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其基调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再度复兴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其学科典范即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打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据。但是,19世纪50年代前后,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开始了重建并重释政治经济学及其实证主义传统。接下来即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哲学迅速发展起来。其中,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及其深受实证主义传统影响的马克斯·韦伯的解释的社会学,直接开创了具有学科意义的现代社会科学。马克思、迪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虽然都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开创者,但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定位方面却有着巨大差别。

在现代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来自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学术传统的尤多,诸如曼海姆、哈耶克、以赛亚·伯林、列奥·施特劳斯、熊彼特、波普、阿隆、萨特、阿伦特、福柯、鲍德里亚、福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史。他们研究的目的,则是通过清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史,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现代性世界展开过程中的一段插曲或一个必经的阶段,从而“反证”自由主义与保

守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当然有必要重视来自外部的批判。但现在的情形却呈现出“一边倒”：现代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基于思想史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实质上否定性的研究，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史层面对现代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传统的批判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及误读，实质上是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立场为前提的。因此，的确不能把由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设定的带有价值判断的论题，当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现成课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存在论层面的论证与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及其思想史层面的拓展及开掘，乃是内在相关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的反思，也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展开的自我批判。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要拒斥或撇开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思想史研究，而在于在参考、借鉴且批判这些资源的前提下，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进而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的水平和质量。

应当承认，相比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历史，相比于目前马克思主义文本、基础理论以及现实研究，相比于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是不足且滞后的。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也多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内史”研究，缺乏思想史研究应有的开放性与比较视野。然而，一门基于某种政治思想理论的学说或学科，必须具备明确的思想史研究或历史分析的自觉意识及其规范基础。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十分必需，而且大有可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同质性的加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漠视与排斥变得越来越明显。以实证主义为学术基础的现当代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无批判地论证并解释现当代资本主义，晚近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更是只限于资本主义之一维。如果说，从19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为止，西方主流学术界还有兴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性的资源，那么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及新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西方主流学术界则越来越拒斥而不是吸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源。新古典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对学术界的宰制，意味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已不可能从内部产生批判性资源。

在现代条件下，保守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作为主流社会政治思潮的补充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既承诺了现代性，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推进了现代性批判，进而使思想向着未来的筹划深入到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之中。马克

思主义的批判,曾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传统实现了某种转化,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对抗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传统中,实际上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未来向度,并逐渐建构了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但是,这个拒绝批判性介入的同质化世界,真的能够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吗?这一度是德里达、罗蒂、乔姆斯基等深感不安的问题,也是福山、奈斯比特等人关注的问题,更是众多激进左翼理论家焦虑而无解的问题。无疑,对这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必须要超越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话语框架,并重新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空间中,把马克思主义当年在近现代转型中发挥的巨大思想资源,再次释放出来。如是,则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不缺乏,反而更具有思想史研究的广阔空间与优势。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有着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得天独厚的现实基础,这就是旨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这一被标举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在其新的世界历史方向上形成的积极成果,也是一条有希望洞穿全球资本主义困境,因而异质于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并在未来的人类文明格局中有更大责任及作为的道路。对于这一已然扎根于并直接推进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道路,显然需要、也值得展开思想史层面的广泛研究: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诸多现代社会政治思潮的对话及其历史效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的现当代转化的内在关系;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逻辑的重述;中国道路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现当代变革;等等,都是一些极有价值的思想史课题。

我们把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解为一项任务。这一视域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当有待于来者辛勤而富于洞见的发掘与开拓。本质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具有自我批判精神、与时俱进,并因此显示其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的哲学与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如若以更为自觉的问题意识及学术担当,来从事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这一研究领域将很快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前言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曾这样说道:“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家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①在这段话中,海德格尔重点是为了表明:正是基于对异化问题的关注,马克思深入了历史的本质之维,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比其他历史学更为优越,只有在这一本质之维中,我们才有可能和马克思进行理论对话。

很显然,海德格尔十分肯定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又来自何处?这个问题直接关乎对唯物史观思想基础、理论来源的定位和把握。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出发去实现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各个范畴的细化研究,而是要跳出既定的唯物史观解释模式和框架,在近现代历史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解析马克思对德国历史主义的批判性态度,进而彰显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发生学语境并为揭示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奠基可能。

众所周知,在19世纪,历史主义是一股由德国的历史学家催生,进而遍及欧洲、影响后世的重要思想。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为什么依然声称“德国没有真正的历史编撰学家”?与此同时,他们所谓的“作为唯一的历史科学”应当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才是正当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在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合法性究竟何在?

所以,在廓清历史主义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在思想史的视野中,通过清晰地说明唯物史观与德国历史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对唯物史观的创生语境和当代意义的发掘与讨论。

^①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以下,我们不妨从研究现状、行文逻辑、主要内容、篇章结构、基本结论等方面对本论题做些说明。

一、研究现状

对于国内哲学界和史学界而言,“历史主义”一词已是耳熟能详,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也早已成为学界的惯常用语。这些理论成就的获得,应该归功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那场讨论^①。

新中国诞生后,为了从思想上端正人们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和自身地位的认识,中央在全社会范围内发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史的学习运动,目的是为了颠覆以往剥削阶级的历史地位,进而确立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为此,1949年7月13日的《北平解放报》刊登了一篇署名“蓝莎”的题为“劳动创造了人”的文章。文章指出,既然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那么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都应该批判。针对这一观点,艾思奇随即指出,这篇文章表现了一定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不能笼统地骂倒一切剥削制度。虽然这场争论并未继续下去,但是,这两位作者的立场已经为继而起的“历史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奠定了基调。之后,一部分学者认为,不能割断历史的发展过程,不能完全否定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一些主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学者认为,应该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作用,这才是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历史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一致性,不能割裂两者的联系。

虽然学界对“历史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兴趣并不亚于此后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心理和政治气氛的影响下,我们不可能奢望这场争论超出意识形态,并收获更多客观化、学术化的思想成果。所以,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无论是历史主义理论,还是阶级斗争理论,都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我们今日所沿用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便是这场运动的产物。仅就基本内涵而言,所谓历史主义主要指的是一种思想认识方法,即要用连续的、整体的眼光认知历史发展过程,要在历史情境中肯定人物、事件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薄今厚古”,否则就是非历史主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主要内涵也无非是为

^① 关于这场争论的述评,可参见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2版。本部分所引述资料主要参考该书第203—225页。

了强调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割断历史发展过程的有机联系。

与中国社会对历史主义一词的朴素认识不同，在西方，“历史主义”一词含义众多。根据美国学者德怀特·李(Dwight E. Lee)和罗伯特·贝克(Robert N. Beck)的考察，“历史主义”一词主要涉及五种含义，它们分别是：(1)一种立足历史进行解释和评价的方式；(2)一种立足当下生活审视历史的方式；(3)一种哲学观念论；(4)历史相关主义和相对主义；(5)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预言和历史决定论^①。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主义远非一场单纯的理论运动，而是一场蕴含着特殊的道德诉求和政治目的社会文化运动，它代表了启蒙理性主义走向自我背反的另一种样式，德国便是孕育历史主义理论的现实母体。所以，在德国历史主义者们用个体化思维代替启蒙运动的抽象性思维之际，历史主义所要揭橥的恰恰是一种为差异性的社会现实进行辩护，进而实现民族认同和国家复兴的价值立场。毋庸置疑，1870年，当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宣告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之际，所有的历史主义者都相信这是德意志特性的真正实现，在此情况下，历史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学术范畴，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已经变成了与启蒙传统决裂的另一种直接样式。

比较中西学界对历史主义的认识论成果，可见：

尽管中国学界曾经在相当大的规模和范围内讨论并普及了历史主义思想，但是，受当时的主观（如研究视野）和客观（如现实需要）因素的制约，我们对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论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历史主义还没有脱离常识的水平，所以，它无法定义，也不能准确说明来由。基于这样的基础，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在理论上的合法性究竟何在？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

与中国的情形不同，在西方学界，或许是因为历史主义自始就象征了对普遍主义价值的质疑和批判，所以，它自萌生之日起就被充分关注和研究，历史主义一词的诸多含义已是明证，并且，西方学者所列举的历史主义五组含义其实已经包含了中国学界对历史主义的含义指称，这是其一。其二，根据特勒尔奇、梅尼克、克罗齐、伊格尔斯等人的观点，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潮流，历史主义从诞生到衰落始终与近代欧洲（尤其是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紧密相关，德国是催生历史主义思想的大本营，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必须与欧洲的近代史（尤

^① 参见焦佩锋：《“历史主义”的五种含义及其评价》，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7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320页。

其是“德国”的诞生史)结合起来研究。

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对“马克思与历史主义的关系”的研究之上。原因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认知其实基于两个很成问题的前提,即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并且,受当时的学术资源和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们既不可能对历史主义进行身份确认和内涵界定,也不可能对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做出本质性探讨。相形之下,在西方学界,虽然对历史主义研究的成果很多,但是,若从研究路数分析,许多学者或者执著于历史主义自身,或者沿着历史科学的路径向史学方法、历史理论提升,或者从历史哲学的层面定义和界说历史主义,鲜有学者结合西方近代思想史的发展来定位、界说历史主义,并探求其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即使有,也不过寥寥几笔罢了^①。

综上所述,对于历史主义本身的清理以及对“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关系的研究是一项必须及时进行的工作。这一论题的直接意义在于:其一,它有利于我们在原则高度理解唯物史观的发生学意义和存在论基础,进而为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奠基更为宽泛和坚实的基础;其二,它有利于我们在当代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背景下讨论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如果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项必须进行的基础性工作。

二、研究逻辑及主要内容

本书的研究逻辑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历史的逻辑,即“启蒙运动—历史主义—唯物史观—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大脉络。本书的各个章节基本按照这个大的脉络进行架构,目的是为了历史地呈现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理论的大致走向。第二条,比较的逻辑。由于需要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说明历史主义与启蒙史观、唯物史观、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关系,所以,本书以“个体性”和“发展原则”为理论脉络,重点讨论了唯物史观对启蒙史观、历史主义以及后现代史学的批判和超越意义。

基于上述论述逻辑,本书的篇章结构及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以“历史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揭示启蒙运动走向自我背叛的可能性及其表现。本章认为,由于启蒙理性主义的泛滥,历史成了任由理性

^① 根据作者掌握的资料,公开说明马克思与历史主义的关系当推英国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相关内容参见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裁剪的对象,因此,“理性与历史”之间的冲突使反叛启蒙成为可能。英国的保守主义(以埃德蒙·伯克为代表)、法国的传统主义(以德·迈斯特为代表)和德国的历史主义(以萨维尼、兰克等人为代表)便是其现实表现。所以,真正的启蒙运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内含着冲突和张力的。启蒙自始就存在着反对自己的力量。当然,作为一种左右着现代性格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辩证运动法则,“启蒙”仍在进行之中。

第二章,主要是清理历史主义自身的谱系及其问题。它包括:还原德国历史主义产生的本土思想背景和现实条件,通过对其发展阶段、表现形式、代表人物、思想观点等方面的揭示,彰显德国历史主义的真正含义、实质、危机及其根源。

第三章,通过梳理文献,表明马克思对历史主义诸派别的批判性态度,它涉及历史法学派、历史经济学派和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学派。本章主要有两方面任务:一方面,全面揭示德国历史主义各个流派不同的理论侧重点及其方法论表现、思想实质;另一方面,完整展示马克思对德国历史主义各个派别的批判性态度和文本依据。

第四章是本书的重点章节。本章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揭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德国历史主义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在此基础上,展开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的批判性对话。

首先,唯物史观与德国历史主义思想之间的根本差异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一方面,就宏观层面而论,历史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表现在对“历史性质”问题的不同回答。在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视野中,由于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所以,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历史中的个体在本质上都具有神性,史学家的“如实直书”其实是以承认“上帝之手”的存在为前提的,其撰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彰显上帝的神力;而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历史并不是因为上帝或者某种神力的存在才可能,它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的结果。简言之,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在本质上属于神,而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在本质上属于人,它是现实的人的生产过程和交往活动的直接产物。

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本部分有意将历史主义的核心范畴——“个体性和发展原则”——放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进行解析和对比。结论是:在“个体性”问题上,历史主义主张,历史中所有有限的个体在本质上都是无限的“精神性存在”,换言之,这种个体的存在论基础是一种泛化的自然神论;唯物史观则

认为,只有在感性的社会存在领域,我们才能领会个体的本质与历史意义,并不存在超越历史条件存在的神性个体。而在“发展原则”上,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对于唯物史观而言,它不仅强调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而且还强调发展的交互视角和辩证逻辑。

所以,历史主义其实从属于被启蒙思想家、青年黑格尔派所批判过的历史有神论,其哲学本质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历史主义展开的全面批判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法性。

其次,历史主义和唯物史观也有一些共同点:它们都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史观,都强调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都力求“客观如实地”描述历史等。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共同点只有在“一般的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意义上才能成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成立。

第五章主要是按照问题史的逻辑,将对历史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讨论向 20 世纪做了一些延伸,这种延伸以“当历史学遭遇后现代主义”而告终。

首先,我们审查了历史主义自身的嬗变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危机。它表现为普鲁士历史学派对兰克历史客观主义的反叛、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历史主义观念的反讽。在此情况下,尽管德国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也在极力替德国辩护,但是,他注定无法扭转历史主义走向衰落的命运。这是因为,历史主义的两个理论支点——“上帝”与“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历史主义自始就存在着无法消弭的逻辑悖论。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主义只能作为一种一般的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被保留和传承,这也是今日各色历史主义的主要的理论依据与内容指称。

紧接着,从历史理论的角度出发,本著作还对唯物史观的当代命运进行了一番考察。经由恩格斯和列宁等理论家之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俨然变成了一门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变成了可以精确测定“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的普遍真理。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这些做法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至少,它引发了使唯物史观陷入一般的实证主义科学的危险,与此同时,唯物史观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也被遮蔽。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攻击,很大程度上与恩格斯和列宁对唯物史观乃至马克思主义的再造有很大关系。

第五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讨后现代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之间的关系,使这种讨论得以可能的标尺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一方面,就后现代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的关系而言,它们都是启蒙的对手,都力求彰显差异性的个体,但是,后现代主义史学显然比历史主义更为激进和过火,这是因为,它只在乎个体、多众、片段、话语,而不在乎纵向、线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这种经由话语和文本来通达历史之境的无本质的历史认识论,必然引发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史学要消解历史本体,历史主义显然并不主张这一点。

另一方面,由于唯物史观也兼具某种结构主义和本质主义特征,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遭遇了被后现代主义攻击的命运,要彰显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必须应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

因此,紧要的问题在于讨论:在后现代主义话语逻辑中,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如何可能?本书认为,回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为无论是历史主义者眼中的上帝,还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本”和“话语”,都不能替代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这件事情本身,这是历史和生活得以可能的根本。当然,在一种极端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历史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都已是过眼烟云,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生活还在继续,生产和交往活动依然在进行,如果我们要反思与此有关的诸多问题,那么,我们首先面对的应该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不是向保守主义靠拢的历史主义或者向虚无主义接近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这是唯物史观总是拥有新的生长点的根本原因。

三、基本结论与研究意义

本书的主要写作目的是:其一,揭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生学语境,尤其是揭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德国的历史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其二,梳理德国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彰显历史主义的含义、实质、问题以及最终走向。其三,在讨论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回答,马克思是不是历史主义者?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能否彼此概括、彼此定义?

基于上述目的,本书的结论是,经由历史理论这个主要维度切入,唯物史观在本质上不仅对启蒙史观,而且对历史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都有批判和超越意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只有在一般的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意义上才能成立,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在本质上格格不入。

这本著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是一项关于历史主义的基础性研究。通过对历史主义的源流、含

义、实质及其问题的基础性探讨,本书较为全面地廓清了历史主义本身的谱系,有利于深化对历史主义的研究。

第二,它是一项思想史研究的初步尝试。思想史研究是繁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方法和主要路径。在启蒙主义传统中,“历史和理性”是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使我们对近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走向的探讨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问题史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维度,只有切入问题、紧跟问题才能激活思想史、理论史。当然,唯物史观也服膺于这一逻辑。这使得对唯物史观的思想史背景的研究成为可能。本书便是从思想史的视野中定位、认知唯物史观的一次初步尝试。

第三,本书是一次跨学科对话的努力。依托特定的问题逻辑和思想史视野,本书重点考察了马克思对德国历史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态度,以及马克思在表明这一态度过程中所激荡出来的历史与现实、观念与存在、政治与道德、历史事件与历史撰述、哲学与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经由这些关系,我们不难省察思想史研究的复杂性和艰难度,但愿这一尝试能够促进学科间广泛而深入地对话。

第四,它是一项关于近世历史理论的宏观研究。在总体上,“历史理论”是贯穿本书所有篇章的一根红线,依托这根红线,我们不仅实现了将启蒙史学、历史主义、唯物史观和后现代史学的串联,而且廓清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与德国的历史主义理论之间的原则性不同。此外,通过延伸,本书还深入讨论了历史主义、唯物史观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区别和联系,这种批判性对读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希望它对于实质的推进唯物史观研究产生积极的意义。

目 录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序 / 吴晓明、邹诗鹏、王金林	1
前言	1
一、研究现状	2
二、研究逻辑及主要内容	4
三、基本结论与研究意义	7
第一章 启蒙与反启蒙的纠结	1
第一节 启蒙运动的目标与特征	1
一、启蒙运动的目标	2
二、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	10
第二节 启蒙运动的内在问题	17
一、机械的科学主义	17
二、普遍的理性主义	19
三、历史：作为理性的材料和对象	21
第三节 反启蒙的思想潮流	30
一、英国的保守主义	30
二、法国的传统主义	34
第二章 德国历史主义的产生及其实质	39
第一节 社会背景与思想资源	39
一、社会历史背景	40
二、直接思想资源	47
第二节 历史主义：从莱布尼茨到德罗伊森	54